

道德崩潰的時代

● 楊 慧

《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讓我們了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出生的德國「有教養階層」中那批頂尖的知識份子，在1933年德國發生史無前例鉅變前後的反應、立場及其命運。



洛維特 (Karl Löwith) 著，區立遠譯：《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

自《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Weltgeschichte und Heilgeschehen: die theologischen Voraussetzungen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從黑格爾到尼采：19世紀思維中的革命性決裂》(*Von Hegel zu Nietzsche: der revolutionäre Bruch im Denk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等中譯本問世後，洛

維特 (Karl Löwith) 及其著述已為中國學術界 (至少中國哲學界) 所熟知。最近其《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 1933*)，引用只註頁碼) 中譯本出版，不僅為中國讀者提供了理解洛維特著述及其思想演變的「佐餐」，也讓我們了解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出生的德國「有教養階層」(*Bildungsbürgertums*) 中那批頂尖的知識份子 (也是最後一代「有教養階層」)，在1933年德國發生史無前例鉅變前後的反應、立場及其命運。

《納粹上台前後我的生活回憶》的寫作緣由，與一般回憶錄、自傳稍微有些不一樣。1936至1940年，逃離德國後的洛維特為了生計，仰賴昔日留學馬堡的日本哲學教授九鬼周造的推薦，前往仙台大學 (今日本東北大學) 執教，流亡於日本。1940年德、意、日三國結成軸心國同盟後，洛維特感受到來自駐東京德國官員的壓力，決意離開日本前往美國，開始拜託友人蒂利希 (Paul Tillich)、尼布爾 (Reinhold Niebuhr) 的介紹，在美國哈特福德神學院 (Hartford Seminary) 謀一教授職位。

正在這個時候，他看到一份馬薩諸塞州康橋鎮懷頓圖書館的有獎徵文廣告。徵文的論題為：「1933年1月30日之前與之後我在德國的生活」，一等獎為500美元。由於不久將要移居美國，這筆獎金對洛維特夫婦來說，有相當吸引力，遂參加了這個徵文比賽。可是由於洛維特參賽的文章涉及學術專業篇幅過多，結果未能入選、獲獎。他生前也未曾想過公開這篇回憶文章。然而，在他故後十三年——1986年，他的妻子重讀這篇自傳性的回憶文章後，在朋友建議下出版了這部沉默了五十年的回憶錄。不知道其他讀者有沒有注意到該回憶錄在1986年公開出版的另一個誘因，那是正值西德戰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一代追究前輩在那個時代的責任的年代，也是展開那場著名的所謂「歷史學家論爭」的年代。

洛維特在這部回憶錄中生動地記錄了1933年前後，他熟識的德國知識階層、眾多的大學者對納粹「革命」的廣泛共鳴和支持，只有個別人進行了微弱的、卻是難能可貴的抵制。由於洛維特執筆之時，距離納粹上台前後發生的事件不到十年，加上事件和政治形勢發展的連續性，因此該書作為史料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大為提高，具有更為重要的學術價值。正如科澤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在該書編者前言中所說的：因為洛維特具有哲學史家的懷疑精神，對人與事保持着一種距離，所以不僅揭露了迎合納粹「革命」知識份子的醜態，而且在描述、記敘那個年代各種人物和事例的同時，「甚至能覺察存在於『具

有德國民族意識』與『懷有強烈國家社會主義心態』的猶太人知識份子之間的細微差異」；能夠把因單純和幼稚而「忠於黨衛隊的學生，與雖然沒有入黨，卻懂得如何順應時局發達、高升的」知識份子區分開來(頁7)。

筆者讀這部回憶錄的時候，注意到書中敘述的作為受害者的猶太人學者在納粹上台前後的反應。他們大多是已為德國文化同化了的「有教養階層」的一員，其中有不少人改宗基督教，甚至從不意識到自己是猶太人，他們已完全融入德國傳統文化之中。儘管在第二帝國時期，德國的大學也有排斥猶太人學者的風氣，可是，那時的德國在歐洲還算是排猶風潮不太昌盛的國家。1933年以前獲得諾貝爾獎的36個德國人中就有16個是猶太人，可見猶太人在德國學術界、文化界的地位與貢獻，而且也反映了他們為了被「同化」所作的努力。

這些被徹底同化了的猶太人知識份子專注於學術，閉守在「沉思」的人文世界之中。就連納粹上台後，比較迅速、準確做出離開德國決斷的洛維特也承認：在1930年代初，他也還是對政治漠不關心、「多年從不看報紙的學術人」，「一直到很晚我才覺察希特勒運動的危險已經威脅到我。」(頁82)同是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弟子，後來成為極權主義研究專家的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那個年代也是如此——長年不讀報紙。流亡到法國之後，因自身遭遇和受後來的丈夫布呂歇爾(Heinrich Blücher)影響，阿倫特才關心起現實政治來。

由於洛維特執筆之時，距離納粹上台前後發生的事件不到十年，加上事件和政治形勢發展的連續性，因此該書作為史料的真實性和可信度大為提高，具有更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德國猶太人知識份子完全「德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受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以來新人文主義思潮的積極影響，也為該思潮攜帶的強烈民族主義「病毒」所污染。

讓今天的讀者更為驚奇的是，當時在由象徵主義作家格奧爾格(Stephan George)領軍的文學圈內，有為數不少的猶太人與納粹的民族主義有內在的共鳴；如果不是因為本身是猶太人、成了「革命」的對象的話，「他們一定會有不少人會投身於這場運動」(頁29)。那是因為強烈的民族主義信念，使得格奧爾格文學圈成員的思想與納粹主義有親和性、親緣關係。「戈培爾曾經隨猶太人貢多爾夫讀書一事，也並非偶然的巧合。」到了必須對1933年新體制作出擁護或反對的表態的時候，格奧爾格本人因納粹政權格調低俗而公開不與體制合作，拒絕擔任普魯士藝術學院詩歌詩人學科主任的職務，移居瑞士。這個圈子內的其他老一輩也因為納粹品味低俗，「堅決反對這民粹的獨裁體制」(頁28)。

儘管如此，包括猶太人在內的年輕一代「則對顛覆性的『革新』十足傾慕」(頁27-28)。比如，同是猶太人的薩琳(Edgar Salin)和辛格(Kurt Singer)從事的專業是民族經濟學，但真正的心志所向卻是希臘的詩和哲學，所以都是格奧爾格文學圈的成員。奇怪的是：前者避難瑞士卻還要「吹噓自己與柏林納粹高幹有良好關係」(頁28)；後者流亡日本依然「崇尚法西斯主義，痛恨一切民主制度，為日本侵略中國辯護」(頁29)，並讚賞希特勒對捷克的動武。和洛維特一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參過軍的哥特翰(Percy Gothein)曾在納粹黨內擔任過職務，但因為父親有猶太血統，後來才陷入相當困窘的處境(頁26)。還有一位意大利學者韋基奧(Giorgio

Del Vecchio)因為是猶太人，在意大利實施種族法後丟了飯碗。然而，他竟然是法西斯主義法學家，只是「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才感到忿忿不平(頁126)。這說明在德國猶太人知識份子完全「德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受到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以來的新人文主義思潮的積極影響，也為該思潮攜帶的強烈民族主義「病毒」所污染。

1933年的「革命」之後，洛維特幾乎失去了他原先在學術圈內所有的友人，包括最親近的友人貝塞勒(Heinrich Bessler)、老師海德格爾和他的學生，人們像避開瘟疫那樣遠離帶有猶太人烙印的洛維特。即使滯留在日本的德國知識份子，也時刻感覺到納粹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壓力無所不在。絕大多數人都小心翼翼地迎合納粹的反猶思潮，與有猶太血統的同胞斷絕往來或保持相當的距離。就連來日本到處作學術演講的斯普蘭格(Eduard Spranger)，也一反早先與柏林大學校長科勞施(Eduard Kohlrausch)、心理學家苛勒(Wolfgang Köhler)那樣公開宣布與新體制的教育「告別」的反對立場，在演講中似乎「變成了國家社會主義的代表」(頁92)。他只能私下對洛維特訴說自己如何受到納粹當局的密謀和暗算的折磨，描繪德國大學的沉淪。洛維特把斯普蘭格作為德國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典型，做了如是批評：

他是一個德國人，必須在德國生活下去，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只能接受，——所以放下他的顧忌，把自己投身於一件任務之中，並將之

視為一種愛國者的義務，——於是便跟大家一起扛起一件惡劣之事的責任，——沒有人願意放棄一份已經習慣又做得很好的工作。(頁140)

當然，在洛維特的所見所聞中，也有根據自己的信仰和良心在公共領域進行抵抗的知識份子，如新教神學家布爾特曼 (Rudolf K. Bultmann)、索登 (Hans von Soden)、巴特 (Karl Barth) 等人，可謂極少數，可能因為宗教道德的他律還在心中；在東京也僅有兩位不參加國家社會主義教師聯盟的德國教師。洛維特回憶中的種種人與事，印證了阿倫特的說法，即人類千年的道德傳統實際根基是很脆弱的，可以在納粹取得政權後一夜之間得以改變，「新規則」立刻能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認可 (ハンナ・アーレント [Hannah Arendt] 著，中山元譯：《責任と判斷》〔東京：筑摩書房，2007〕，頁65-75)。

在〈獨裁體制下個人責任〉(“Personal Responsibility under Dictatorship”)一文中，阿倫特說：這種喪失信仰和忠誠的屈服也可以說是「有教養階層」的一種特有的「症候」。人們不僅是感覺到暴力的威脅才屈服、追隨納粹運動，不少人實際是怕趕不上新時代起點——「歷史的步伐」而主動地參與其中。所以，誘惑與威脅一樣，同樣能使人喪失道德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在法庭上，藉口因為自己受到威脅或利誘才行惡，只能作為威脅、利誘者犯罪的證言，但是這不能成為自己屈服的道德上的正當性理由。那些拒絕在公共領域與納粹配合的人們，是僅有的還能用自己的頭腦依

據原先的善惡標準做出道德判斷的人們，他們的良心不會隨波逐流地轉變。這些堅持習慣的道德準則的人們，也就是帶有疑問自己，不願意自己與自己(良心)過不去、下決斷的人們 (ハンナ・アーレント [Hannah Arendt]：《責任と判斷》，頁26)。

前面提到，科澤勒克認為洛維特具有哲學史家的懷疑精神，這也是這部回憶錄的價值所在。在該回憶錄及洛維特其他著述中最明顯的特點是：他的學術思想儘管有繼承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深刻印記，但是始終未停止過對海德格爾的學說和人格的批判。在這部回憶錄裏，他明確提出，可以從海德格爾哲學的基本原理中來尋求他投靠納粹這一政治選擇的原因，而不應該把他的哲學與政治選擇割裂開來考察。在這一點上的明確立場，他遠早於阿倫特提出。海德格爾的「時代精神」是有雙重涵義的(頁53-54)。沃林 (Richard Wolin) 在《海德格爾的弟子》(Heidegger's Children: Hannah Arendt, Karl Löwith, Hans Jonas, and Herbert Marcuse) 一書中有關這個問題的分析，也是援引洛維特在該回憶錄裏相關的論述 (沃林著，張國清、王大林譯：《海德格爾的弟子：阿倫特、勒維特、約納斯和馬爾庫塞》〔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頁91)。

最後必須一提的是：這部回憶錄最後的人名索引標出了中譯本的頁碼，而不是貪圖省事按照德文版的頁碼 (通常是邊碼)。在進入電腦製版的時代，這一小小的「與國際接軌」的「改良」，將為不少中國學術界的讀者帶來了檢索上的便利。

科澤勒克認為洛維特具有哲學史家的懷疑精神，他的學術思想儘管有繼承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深刻印記，但是始終未停止過對海德格爾的學說和人格的批判。